

成功的失敗者——

張學良
傳



道義之交



「不能忘記老朋友」

「死生亦大矣！」一個人在告別這個世界時的遺言，歷來被看作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生命囑託，一種具有紀念性、經典性、持久性的臨終交代。如果當事人是一位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的政治家，一位轟動世界、名垂青史的偉人，那麼，他的遺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義和不容忽視的價值。

周恩來總理在瀕臨生命終點時，鄭重囑咐：「不能忘記老朋友。」這句普通至極的家常話語，卻是飽含著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個字，雜和著血淚，凝聚著深情，映現著中華文明倫理道德的優秀傳統，閃射著偉大革命家高尚人格與政治遠見的奪目光輝，當然，裡面也滲透著我黨數十年來鬥爭實踐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內政外交，內憂外患，長年累月超負荷的繁重公務，嚴重地損害了周總理的健康；而「四人幫」的明槍暗箭、百般刁難、重重設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更使他的心靈飽受痛苦的煎熬。這種長期、持續、強烈的「孤樹加雙斧」般的折磨與摧殘，生生地把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儘管他以永生不知疲倦的鋼澆鐵鑄的硬漢著稱，儘管他有無窮的精力和驚人的毅力，最後也不得不在疾病與死神面前敗下陣來。

已經廣泛轉移的惡性腫瘤，時刻侵噬著他的內臟與肌骨，消耗著體內的營養物質，使他的身體虛弱至極。原本一米七三的偉岸身軀，最後形銷骨立，只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體重。住院二十個月，經過大小手術十三次，輸血八十九次，身上插著氧氣管、輸液管、引流管，還有心電圖監護儀的電極板，以致連翻身都受到了限制。躺在病床上，他的胸部微弱地起伏著，顴骨高高隆起，蒼白的臉龐上布滿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陷著，已經不能再現往日那種發光閃電、炯炯有神的異彩。

總理的頭腦依舊非常清晰，思維十分敏捷。面對已經叩響生命喪鐘的死神，他態度安詳，坦蕩自若，風趣地說：「馬克斯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他知道生命屬於自己已經時日無多了，便抓緊這最後的有限時光，安排好各項重要工作。大至取得毛澤東主席的支持，選定鄧小平為助手，統籌四個現代化，遍及經濟、科教、外交、軍事和「全面整頓」，小到檔的歸還，死後骨灰的處理，一一做出最後的交代。

一九七五年，對於中國來說，這是異常艱難的一年，舉國上下在憂心忡忡中度過。而周恩來的病中歲月，更無異於在刀尖劍芒上翻滾，歷經著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後，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癌細胞迅速擴散到腹腔內臟，轉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引致周身上下劇烈疼痛，經常是渾身抖顫，大汗淋漓，各種鎮靜、止痛藥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十二月二十日清晨，一直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見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羅青長。可是，待到羅青長匆匆趕到，護士卻悄悄地告訴他，總理已經昏睡過去，請他在隔壁房間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時分，周總理才甦醒過來，親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邊，然後，翕張著乾癟的嘴唇，以微弱的聲音，吃力地詢問了臺灣近況和在臺的一些老朋友的現狀，最後，鄭重囑託：「不能忘記老朋友。」停頓了一下，又稍加解釋：

「不能忘記那些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們，那些幫助過我們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過一件有益於革命的事，比如還在臺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

羅青長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了四十多年，聽過總理多次部署對臺工作。他知道，「在臺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張學良將軍。總理多次同他談過，張學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偉大人物，西安事變挽救了國家民族的一大危機，為中華民族促成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那麼，另一位「姓張的朋友」呢？羅青長也曉得，指的是張鎮先生。事情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談判正在進行中。在簽訂《雙十協定》兩天，一直致力於國共合作的國民黨要員、談判代表張治中，舉行盛大酒會宴請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當晚突然發生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途中遭國民黨士兵槍擊事件。聞訊後，周恩來立刻警覺起來，深為毛澤東主席的安全擔心，於是，向出身於黃埔軍校的舊相識、時任國民黨重慶憲兵司令的張鎮提出「派兵護送」的要求。張鎮立即調來憲兵司令的座車，並親自護送毛澤東返回紅岩。第二天，張鎮又進一步加強了警衛工作，凡屬毛澤東參加的活動，他都親自布置警戒。國共和談協定簽字後，張鎮得知毛澤東一行要飛回延安，便親自護送到機場。張鎮後來去了臺灣，但周恩來一直銘記著這件事，曾經囑咐過羅青長：「將來臺灣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張鎮的這一功勞。」彌留之際，又再次作了提醒，唯恐將來實際處理時有所忽略。

據張學良研究專家畢萬聞提供資料稱，是年九月，當周總理聽說張學良患上了眼疾，有失明危險時，感到十分焦慮，當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有關部門查清具體情況，批示的最後三個字是：「托、托、托。」這是周恩來生前無數份批示中的最後一份。

周恩來與張學良相識、相知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東北軍的團長高福源，率領六一九團進攻陝北蘇區榆林橋時，被紅軍俘虜，爾後進入政治學習班學習，聆聽了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人的講話並受到接見。這使他深受教育，主動提出，回去要面諫張學良，達成與紅軍共同抗日。經過研究批准，高福源帶上了周恩來的親筆信，返回東北軍駐地，說是有重要機密要面陳張副總司令。張學良拆封後，見信中提出，「中國人不應該打中國人，東北軍應該調轉槍口，對準真正的敵人，即在東北燒殺搶掠的日本軍隊」，他極表贊同，深受觸動，決定與紅軍高層代表會談，共商抗敵大計。這樣，高福源便於翌年一月十六日重返蘇區，面見毛澤東、周恩來，轉達了張學良要求紅軍派代表商談的意見。於是，雙方代表坐在一起，就聯合抗日問題，進行多次秘密商談，達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並建立電臺聯繫等項協議，在紅軍同東北軍之間搭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樑。

在此基礎上，四月九日晚九時，時任「剿共」副總司令的張學良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在膚施（延安）清涼山下一個天主教堂裡秘密會晤，商談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總體目標；討論了抗日救國應走什麼道路，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等重大課題，以及通商、交通、互派代表、培養抗日人才等具體事項。商談中一個焦點，是如何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建立怎樣的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張學良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先生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全國主要軍事力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財政、金融、外交等也由他一手包辦。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果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周恩來說：「我們共產黨並非不願意爭取他，而是考慮到可能性不大。蔣氏在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卻一直

鼓吹『攘外必先安內』，這與西太后的『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賣國主張如出一轍。」最後，周恩來表示，只要蔣先生實行抗日，共產黨和紅軍是願意在他的領導下，捐棄前嫌，一致對外的。

五月十二日夜，兩人又舉行了第二次密談。

現當代黨史專家認為，膚施會談真誠、直率、平等、友善，為不同性質的軍隊在民族危亡之際，攜手禦侮，特別是為日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準備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條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雙邊談判的一次成功範例。

通過會面懇談，兩位高層領導人各自給對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後，周恩來興奮地說：「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朗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張學良，說：「座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並電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同時，他又提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

張學良對這次會談也感到非常滿意，說：「比我想像中好多了，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見如故。周先生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有情有理，給我印象很深，解決了我很多的疑難。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他知道當時紅軍經濟上正處於窘境，遂以兩萬銀元的私款相贈；回到西安後，又慷慨捐贈了二十萬元法幣。據紅軍軍需帳上記載，這期間，張學良共接濟紅軍七十六萬元。

七個月後，西安事變發生，周恩來應張學良邀請，飛抵西安，兩人朝夕相處了八天，共商和平解決善後事宜。據《世紀情懷——張學良全傳》一書記載，當時，張有千頭萬緒的事情等著商量：南京方面揚言，要炸平西安，應該如何應對？國民黨大老于右任要來西安安慰，應該怎樣答覆？宋

子文要前來談判，西安方面要怎樣提出基本條件？對如何處置蔣氏，意見分歧很大，應該如何統一？……這一切，都有待商量，有待決斷。書中記載：

十七日傍晚，周恩來一到，張學良立即熱情地將他迎入公館，然後促膝長談，直到深夜。張向周介紹了有關情況，並談了對蔣介石的想法後，徵詢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闡述了中共對西安事變的性質、前途的看法和處理方針。指出：西安事是震驚中外的大事件，但它跟革命戰爭與群眾暴動不同，它是趁蔣氏來西安視察，採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做法捉拿了他，這不免帶有一點軍事陰謀的性質。把蔣捉住了，並不等於勝利；華清池扣蔣，既不同於十月革命中生擒沙皇尼古拉，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活捉拿破崙。因為蔣的政權沒有被破壞，他的軍事力量還原封未動，西安與南京已處於對立的地位。因此，對蔣的處置要十分慎重。

周恩來同意張學良的分析，根據國內外形勢判斷，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時指出，西北的「三位一體」將是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

周恩來接著談了西安事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一個是好，一個是壞。如果能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本滅亡，這樣就會使中國的前途變好；如果宣布他的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把他殺掉，這樣不僅不能停止內戰，還會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不僅不能抗日，而且還會給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提供條件，這樣就會使中國的前途變得更壞。我們要共同努力爭取好的前途，力爭說服蔣介石，只要他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

釋放他回去；還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這有利於發動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

張學良認為，中共關於西安事變的分析、判斷，以及處置這一重大事件的構想，與他的觀點、主張不謀而合；特別是對於共產黨從全域利益出發，捐棄前嫌，深明大義的胸懷與立場，感到由衷的欽佩；而周恩來的高瞻遠矚，洞悉全域，過人識見，超凡氣度，尤其令他極表敬服。在此後的八天時間裡，周恩來一直同他合作共事，精於籌劃，巧於斡旋，使他感到有了主心骨，有了幫手，大大地增強了信心。

此後便是長別，他們再也沒有見面機會了。古人論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話，用以表明朋友間的暫時歡聚；周、張的幾番密晤，也只是「十日緣」——其實，滿打滿算，不過是八天加上兩個夜晚——卻建立了歷數十年不變的深厚友誼。

「我的眼淚是代表黨的」

世人結交，多種多樣。有總角相識，友誼深結，始終堅守不渝的故舊之交；有相逢於危難之中，共濟時艱，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許的患難之交或生死之交；有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聲應氣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風慕義，精神上相互信賴、相互砥礪，事業上相互支持的道義之交；當然也有趨炎附勢，私利交接，彼此互為利用，勢衰而交絕、利盡而情疏的勢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來與張學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難之交與道義之交的共同特色。他們年歲相若，而出身、閱歷、教養和成長的政治環境，則迥然不同，尤其是兩人的個性、氣質乃至處世方式差異很大，一為

沉穩內斂，務實縝密，立身謹嚴、端莊、肅穆，不苟言笑；一為狂放不拘，任情適性，詼諧、幽默，無所顧忌，隨意性很大，有時感情用事。但是，由於為人正直真誠，重義守信，顧全大局，富有政治遠見等共同基點，這兩位時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見如故，在國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義之上，泯除了出身、個性方面的差異，結為至交、摯友，情深義重，終始如一。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被周恩來譽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張學良將軍，在接見祖國大陸《百年恩來》專題藝術片的攝製組時，盛情讚佩周恩來，說：「他是我認識的共產黨最偉大的人物。……中國我只佩服幾個人，周恩來是第一個。」

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問時，張學良說：「我和周恩來能夠相互理解。他反應很快，對情況的判斷很準確，說話一針見血，不用對方多說話，就能準確地抓住要害，是個見識很廣的人。我和周恩來雖然初次見面，卻像老朋友一樣，披肝瀝膽，一見如故。」

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周恩來屬於聖人所說的直友、諒友、諍友。剛一見面，周恩來就毫不客氣地說：「張將軍既是集家仇國難於一身，也是集毀譽於一身的。您處心積慮，要雪國恥，報家仇，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錯了！……您要走抗日救國之路，就一定要走依靠人民群眾的路線。」這番洞穿實質、直截要害的諫言，對於彷徨無計、四面受蹙的張學良來說，不啻醍醐灌頂、當頭棒喝。

而當得知張學良要親自送蔣回寧時，周恩來立即趕往機場，想要勸阻這一莽撞行動；無奈，待他趕到時，飛機已經騰空而去。雲天遙望，周恩來悵憾良久，慨然地說：「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太深了，他不但要『擺隊送天霸』，而且還要『負荊請罪』哩！看來，感情用事，總是要吃虧的。」後來，周恩來每當談及此事，總是連聲自責，痛悔自己「沒有保護好漢卿先生」。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周恩來說：「在剛才這幾分鐘的靜默中，我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們在這裡談團結，這個人對團結的貢獻最大，這個人就是促成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張漢卿先生。我們懷念他，誠懇地希望他能早日獲得自由。」

同年十二月，延安各界紀念西安事變十周年，周恩來在大會講話中指出：「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一年多了，然而張、楊兩將軍卻被蔣介石幽禁了十年。這段公案，人民會起來給以正當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會真正堅持釋放張、楊。那些擔保張、楊無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們，卻早已忘恩負義、食言而肥。在紀念『雙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們要求立即釋放張、楊兩將軍，他們是有大功於抗戰事業的。」

一九六一年，在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周恩來在講話中高度肯定了事變的重大意義，並對張、楊兩將軍表達了深摯的懷念之情。張學良的四弟、解放軍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在給周恩來總理敬酒時，感情衝動，泣不成聲。周總理也流下了熱淚，他深情地對大家說：「我的眼淚是代表黨的，不是我個人的。二十五年了，楊先生犧牲了一家四口，張先生還囚禁在臺灣，沒有自由，想起他們，怎能不落淚呢？」

他不放棄任何機會，始終不遺餘力地設法營救身陷囹圄的張學良，密切關注著他的安全與健康，不只一次地對來自臺灣的朋友說：「如果張將軍的生命有個一差二錯，我們就不好見面，不好說話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周總理聽說西安事變中的擔保人、已經定居美國的宋子文來到了香港，便托人代為傳話，敦促宋子文為釋放張學良做出努力。宋子文很不好意思，回話說，當時確有三條

保證，停止內戰、對日抗戰這兩條已經兌現了，至於確保張、楊兩將軍的安全這一條，「請轉告周恩來先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實在無能為力，請予諒解。」

四十年間，周恩來無論是置身龍潭虎穴，談判桌前折衝樽俎，還是戎馬倥傯、輾轉征途；抑或是執掌銓衡，日理萬機；直至纏綿病榻，備受疾病煎熬，日夜與死神搏鬥——不管處於何種境況之下，總是時刻記懷著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每當談到張學良將軍時，他都是一改平素端莊整肅的常態，情緒非常激動，多次淚流滿面。

不僅對張學良本人，連他在大陸的親屬，周總理也關懷備至。母親死時，張學良年僅十二歲，胞姐首芳長他三歲，擔負起照顧弟弟的責任，因此，姐弟二人感情甚篤。首芳後來嫁給了黑龍江督軍的兒子，父親張作霖死後，便被丈夫遺棄了，從此她情懷蕭索，鬱鬱寡歡。西安事變之前，她一直跟隨著張學良馳驅南北，顛沛流離。新中國成立後，張首芳定居北京，由於沒有經濟來源，生活出現困難。周總理得知後，特意為她調配了一處住房，並給她發放定期補助，保證其安度晚年。

長時期以來，周恩來總想給失去聯繫多年的張學良寫一封信。只是，海峽兩岸一水遙隔，要把信傳遞到受到嚴密控制的張學良手裡，又不致給他帶來危害，確是難乎其難。光是選擇遞信人，就大費周章。據張學良研究專家竇應泰考證，周總理寫好了信之後，中央有關部門找到了定居香港的朱湄筠女士。她在臺灣有許多親友，本人又對祖國大陸情感深厚，特別是父親朱啟鈐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總理和中央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當即答應，要親自出面轉交密信。她於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了臺灣，一直等到十月十日才找到了機會。這天，張學良參加一項公開活動，她通過早年相識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層的信轉交到張學良手裡。老將軍拆開這封天外奇函，

看到信箋上赫然寫著十六個字：「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從飛揚、凝重的筆跡和情真意切、文采斑斕的詞語上，辨識出這是出自周公之手。他為在北京的老朋友並沒有忘記他，為這厚意深藏、一往情深的話語，為老朋友時刻以他的安全為重的周到細心、關懷備至而深深感動，頓時熱血奔騰，潸然淚下。

政治引路人

「平時不下淚，於此泣無窮。」周恩來和張學良都是意志力極為堅強的人，是中外聞名的硬漢子。可是，為了張學良的被難，周恩來竟先後三次在大庭廣眾之中痛哭流涕；而羈身孤島、淪為階下囚的張學良，也以同樣真情灼灼的淚水與之對接，從而匯成一股連接兩岸、綿延不絕的情感渦流。

張學良把結識周恩來引為終生幸事。據畢萬聞〈周恩來與幽禁中的張學良〉一文中記載，西安會面之後，張學良對周恩來一直感念不忘。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受顧祝同的派遣，到溪口拜見張學良。張學良聽了何柱國等人的彙報之後，公開地給楊虎城、于學忠各寫了一封信，表示凡有利於國者，一切都無足顧惜，囑告東北軍將士和衷共濟，「以期在抗日戰場上，顯我身手」。並要何柱國暗中轉告部下：「我為國家犧牲了一切，交了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這個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除了寫給楊、于的兩封信之外，張學良還背著看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親筆信，要何柱國秘密轉交。不久，周恩來就收到了此信。主要內容如下：

柱國兄來談，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弟目下（閑）居讀書，一切甚得，請勿遠念。凡有利於國者，弟一本初衷，絕不顧及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並請代為向諸同人致敬意。

信中「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這番話，概括了周恩來在此一階段卓絕艱苦、冒險犯難，對東北軍所做的全部工作。周恩來後來曾說：「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這一切，張學良聞知之後，甚為感動，因而寫了這封密信，對周恩來的「大無畏精神」深表敬意，對紅軍的「種種舉措」表示感佩。因為顧及張學良的人身安全，周恩來與何柱國從未對外披露過這封信。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周恩來又收到監禁中的張學良從貴州桐梓縣天門洞捎來的一封親筆信：

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有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做紅娘。願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視想也。近日友人慘死，數難聞之，為之一痛，只心弔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餘不盡言。

信，前無稱謂，後無落款，當是彼時險惡的處境使然。據有關學者考證，此信應為前往貴州探

視的東北元老莫德惠帶往重慶交給周恩來的。

張學良說過，他的一生，他的祖國，幾乎被日本給毀了。他之所以發動西安事變，根本目的就是抗日。所以，信中說：「現日寇已經驅出，實最快心之事。」鑑於周恩來抗戰後在重慶重開國共和談，因而有「奔走國事，再做紅娘」之說。在張學良看來，「周恩來是極有才能、大膽的人」，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釋放蔣介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戰勝利後，他祝願周恩來在國共和談中「早成佳果」，使國家走上和平統一的富強之路。至於信中所謂「近日友人慘死」，有關學者分析，當是指「四八慘案」中王若飛、葉挺等所乘飛機在黑茶山遇難一事。「數難聞之」，可能說的是發生在年初的重慶「白滄堂事件」、「校場口事件」。

出於同樣考慮，此信也一直沒有公開。

鬥爭經驗極為豐富的周恩來深知，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張、楊極為忌恨，楊虎城一家四口慘遭殺害，就是明證。在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後，周恩來擔心大陸方面對張學良過於直白的關懷和讚譽，會刺激蔣介石脆弱而敏感的神經，致使張學良的處境更加險惡。因此，曾多次囑告有關部門，所有涉及張學良的宣傳、報導，都要嚴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顧及其人身安全。一九七四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蔣介石已經身染沉痾，想趁機發動輿論攻勢，要求恢復張學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總理得知後，在熱情稱讚這種伸張正義的行為的同時，耐心勸阻他們暫時不要這樣做。周總理說：蔣介石還沒有去世，但他對張學良的忌恨已經淡化了。你們這麼一呼籲，戳痛了蔣介石的瘡疤，可能會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臨死前，對張學良先下毒手。

張學良憤慨於蔣介石背信棄義、踐踏承諾，十年監禁使他吃盡了苦頭；他自然渴望著儘早擺脫

羅網，恢復自由，可說是朝思暮想，夢寐以求。這個機會終於出現了。一九四六年秋，蔣介石迫於各界人士呼籲釋放張學良的強大輿論壓力，派人前往貴州桐梓，同張學良「談判」解禁條件。首要一條，就是公開承認：他聯合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是上了共產黨的當，中了周恩來的圈套，現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面對這場嚴峻的考驗，張學良大義凜然，堅定認為，儘管獲得自由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但絕不能以說假話、出賣靈魂、褻瀆感情為代價。他當即對前來做說服工作的人士說：

西安兵諫，事前我沒有同共產黨作過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沒有人事前向他們通風報信。兵諫後，我提出的條件，委員長不答應，南京方面企圖搞渾水，大兵壓境，親日派蠢蠢欲動，東北軍內少壯派要殺蔣的情緒也已經點燃，一時劍拔弩張，西安形勢極為危急，有違我發動兵諫的目的。在這樣情勢下，我彷徨束手，問策無人，才電請周恩來到西安來，參與對事變的解決，為的是實現聯共促蔣抗日，拯救民族滅亡的危機。

又不是他們攛掇我捉的委員長，這怎麼能說我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呢？只能說在抗日的問題上，在不打內戰的問題上，我與共產黨取一致的立場，這也是中國人應持的愛國立場，這麼能說我中了周恩來的圈套呢？我這個人可能什麼都不好，但有一條，我不撒謊，不做對歷史不負責任的事。如果為了換得自由，我就那麼說，那我還是張學良麼？

當然，張學良自己也承認，他之所以對周恩來終生感念，首先是他把周恩來作為「政治引路人」看待，認為周恩來是他長達半個世紀幽禁生涯中一盞閃亮在心中的希望之燈。一九七六年一月，當

他聽到周恩來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傷懷痛悼，萬分難過。他含著淚水對夫人趙一荻說：「中國失去了一位傳誦千古的偉人，我失去了一位終難忘的故友。」後來，在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先生交談中，他又提到：「聽人告訴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險，還讓他身邊的人查明情況，看能不能為我做點什麼。這樣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幾人？」鄧穎超病逝時，已經身在美國的張學良，特意委託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替他和夫人送上一個花圈，擺放在鄧穎超的靈前。他極為珍視同周恩來夫婦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直到生命的結束。

這裡有一個細節。美籍華裔學者、《張學良探微》一書作者張之宇，在整理《張學良日記》過程中，注意到這樣一條記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

同劉、許等乘自行車赴安源，行約十五里，抵礦區，遇該礦工程師張某，係營口人，比（利時）國留學生，導余等入礦洞參觀。歸來已黃昏。

張之宇好奇地問：「張先生，您怎麼對礦井這樣有興趣，還專程去探訪？」張學良告訴她：「周恩來年輕時在國外留學，曾在井下當過礦工。所以，我也想體驗一下礦井的生活。」

「您怎麼知道的，周恩來當過礦工？」張女士驚異地問。

「斯諾的書上寫的。」張學良回答，書上說：「周恩來在巴黎默默無聞，是個窮困的中國人，當過礦工和侍者等臨時工，只有在無產階級當中受到歡迎。」

說著，張學良長歎一聲：「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見周先生一面，可是沒有實現。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沒能再見到周恩來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終身遺憾。」

